

被遺忘的五四：周策縱的海外新詩運動

王潤華*

一、《五四運動史》：文化研究的新典範

西方傳統漢學，在早期，是一門純粹的學術研究，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他們的漢學家，往往窮畢生精力去徹底研究一個小課題，重視的是冷僻的、業已消失的文化歷史陳跡，較和當下現實無涉。因此傳統的漢學研究的研究者，往往不求速效，不問國家大事，所研究的問題，也較沒有現實性與實用的功能，終極目的往往在於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動力是純粹趣味。¹周教授的一些著述如《論對聯與集句》、²《破斧新詁：《詩經》研究之一》，³《周策縱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討論龍山陶文的論文，⁴就充分表現「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⁵

美國學術界，自二次大戰以來，已開發出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Sinology）很不同的研究路向，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它與漢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它開出一條與現實的思想性與實用性相關的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其目的，一方面在於瞭解中國，另一方面也希

*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

¹ 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見《十年機緣待儒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3。

² 《論對聯與集句》（香港：友聯出版社，1964年）。

³ 《破斧新詁：《詩經》研究之一》（新加坡：新社，1969年）。

⁴ 〈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山東省鄒平縣丁公村龍山文化陶文考釋〉，《明報月刊》1993年12號-1994年2月，pp.136-138, 92-94, 108-111。

⁵ 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見《十年機緣待儒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3；余英時：〈費正清的中國研究〉及其他論文，見傅偉勳、歐陽山編：《西方漢學家論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1-44及其他相關部分。

望促進中國瞭解西方。中國研究是在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興起，也帶動了從邊緣走向主流的專題研究。前者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而後者對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則是傳統以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理論模式，一旦碰到新興的如性別與文學問題，更是以前的治學方法，難以詮釋的問題。因此，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的衝擊等學術大思潮下，所產生的多元取向的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中國學」的研究，成為新的發展潮流，哈佛大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零年代，更日漸形成主流。周教授在這期間，也正好在哈佛擔任研究員，⁷他的成名作《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⁸的完成與改寫出版，都在哈佛的中國學的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潮中發生的，他的〈中文單字連寫區分芻議〉，發表於一九八七年，竟然一九五四年就寫於哈佛大學⁹，此類專著或論文，完全符合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其思想性與實用性，都帶有強調當代中國問題的精神。另一方面，區域研究的思潮也使得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得到突破。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對權威的著作，成了東西方知識界認識現代新思文化運動的一本入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範。

《五四運動史》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和歷史提出系統的觀察和論斷，奠定了作者在歐美中國研究界的大師地位。其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

⁶ 同前註，頁 1-12。

⁷ 周策縱於一九四八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一九五〇年獲碩士，一九五五年獲博士，《五四運動史》，原為博士論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他在哈佛大學歷史系任訪問學者寫論文，畢業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到哈佛任研究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榮譽研究員。

⁸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⁹ 羅慷烈主編：《教學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二十週年紀念專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1987年），pp135-152。

括中、日、西方語文的檔案資料，是窄而深的史學方法的專題（monograph）思想文化專題的典範著作。周教授研究《五四運動史》中所搜集到的資料，本身就提供與開拓後來的學者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文學的基礎。因此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也將其出版成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¹⁰同時，也由於不涉及道德的判斷或感情的偏向，突顯出客觀史學（現實主義史學）的特質。周教授在密西根大學念的碩士與博士都是政治學，因此社會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學等）影響了他的現實客觀的歷史觀，這正是當時西方的主流史學，這點與費正清的社會科學主導的客觀史學很相似。¹¹而且被奉為在中國研究中，跨越知識領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範。

二、周策縱被遺忘的另一部五四運動史：新詩史

然而，周老師另一部五四運動史，就被人所遺忘了。因為這是五四新詩史，周老師以寫新詩的形式來書寫的，從未出版，少為人所知。他自己卻非常重視。

我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九日收到周師母吳南華醫生從陌地生（Madison）寄來一個大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等待很久的周策縱老師新詩全集。¹²周師母在信中說：

策縱的詩稿終於整理好了。現在給你一份，是經過兩個人幫忙和最後我用了許多深夜的時間，才把策縱那一堆堆的亂紙排成稍有次序的詩稿。以後一切都要請你幫忙了。

接著師母順便報告罹患失憶症的老師健康情況：

策縱近來還好，食量比三星期前好的多。他喜歡我弟妹做的菜。他每天

¹⁰ Chow Tse-tsung,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¹¹ 參考余英時：〈費正清的中國研究〉，見上引《西方漢學家論中國》，頁 1-44。

¹² 這部詩集原本周老師自己編好，定名為《胡說草》，現增加遺漏的，已在編輯出版中。

走一小段路，看傳記文學和他自己寫的文章和詩。

師母的信是六月九日寫的。師母與女兒琴霓這次回返陌地生是搬家，從此就定居在加州舊金山北邊的阿巴尼（Albany）了。這次原本周老師要一起回去搬家，但由於它的健康體力突然惡化，便沒有回去，留在加州由師母的弟妹照顧。

周老師十多年來，多次跟我討論整理與出版詩集的計劃，希望把舊詩詞、新詩以及他和美國白馬社的詩人群的作品，進行出版。在二〇〇七年五月七日逝世前，雖然嚴重失憶，還是如師母所見，每天愛看自己的文章與詩作，可見他對詩與學術，一樣重視，都是他生命中追求的終極目標。老師一九四八年離開中國前往美國留學以後，新舊詩的創作從不間斷，他在一九六一出版過新詩集《海燕》以後，就沒有出版過專集。八十歲以後，他開始很緊張，因為他長期以來想出版的詩集，沒有一本付諸實現。在他往生前，幸好《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於2004年出版，¹³《周策縱舊詩存》也於2006年出版。¹⁴而他的新詩集《胡說草》今年就可出版。

寫詩對我的老師來說，是延續五四文學的革命，他一直以生命來對待，所以當今年三月初，師母撥電話找我，告知我，老師得了嚴重的肺炎，送醫院後又不幸中風，昏迷不醒。便還特別問我有關詩集可能出版事，我說已付印中，師母後來告訴老師，他好像聽了有反應。或許可見他對詩集出版非常重視，也因此似乎就放心去了。

三、《海外新詩鈔》：繼承大陸五四白話詩傳統的使命

我在〈周策縱：學術研究的新典範〉中曾指出，¹⁵周教授另一項貢獻是其他重要國際學者所沒有的，就是鼓勵與推動文學創作。他與世界各地、各個世代的作家，從歐美、臺灣、香港、新加坡、大陸都保持密切的往來。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影響了文學的自然發展，他就積極參與美國華人的文

¹³ 心笛、周策縱編：《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臺北：漢藝，2004年）。

¹⁴ 陳致編：《周策縱舊詩存》（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策劃，匯智出版，2006年）。

¹⁵ 王潤華：〈周策縱：學術研究的新典範〉，《世界文學評論》2006年第二期，頁201-205。

學藝術運動。文學方面有白馬社，文化方面有《海外論壇》。他將自己與黃伯飛、盧飛白（李經）、艾山、唐德剛、心笛等一九四九年以後留居海外的詩人，看作負著繼承大陸五四以後白話詩的傳統的使命，因此多年來默默收集海外的詩歌作品，並希望擴大包括香港的詩人，以編印《海外新詩鈔》，可是由於計劃太大，一拖再拖，至今沒有成功。心笛說：

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策縱教授就想編選《海外新詩抄》，收集美國與香港那時報刊上的新詩，因為他認為海外的新詩，最能承繼五四新詩的風格，不受大陸中國與台灣兩地那時詩壇的影響。他搜集的詩稿，曾由詩人淡瑩幫助編選剪貼，以為在八〇年代初期即可付印。廿多年來，「只聽樓梯響」，但不見書的出版。

知悉周教授講學著述及學術研究極忙而無暇顧及《海外新詩抄》後，我為了想促使該書的早日問世，自告奮勇，請周教授將舊稿找出寄來，由我幫助整理稿件。二〇〇一年，周教授終於在萬卷藏書的家中，好不容易尋出舊稿，自陌地生寄到加州給我。這些藏了幾十年的稿件，有許多泛黃的紙頁與模糊不清的字跡，都得一一重新抄打或影印。於是我查看世界線上書庫、借集子、影印、剪貼、補選。並依周教授之言，多選白馬社社員之作。我寫信給唐德剛教授、親去黃伯飛教授住處索稿。瑣瑣碎碎的整理過程，使我了然而何《海外新詩抄》會被擱置一邊這麼多年。整理出的詩稿竟達五、六百多頁。入選人詩作的數量參差不齊，有多至七十幾首的，有僅有一首的。其中白馬社社員的作品量數最多。正在為難如何刪減白馬社人的作品，詩人出版家林蔚穎先生與洛山磯《新大陸》詩刊主編陳銘華先生同時建議將白馬社社員的詩作放在一起，出一個《白馬社新詩選》的集子。這真是一個很有見地的建議，也正合我早年有過的心意，於是我又重新增選白馬社社員的詩作。我們為能出《白馬社新詩選》而高興，但也為《海外新詩抄》又得暫時擱淺而感到惋惜。若能兩本書同時出版該是多好！但願不久有機緣能將《海外新詩抄》付印，

以圓周教授多年的心願。¹⁶

黃伯飛教授也曾說：「策縱兄希望把艾山和我其他幾位的詩放在一起，作為一九四九年以後居留海外的同好們，繼承五四以後白話詩的傳統的一個集子」¹⁷ 所以周老師的《海外新詩抄》仍然沒有出版，五四白話新詩革命史仍然缺少重要的一章，因此我們的白話文學史，至今仍然是不完整的。

四、胡適：「白馬社是中國的第三文藝中心」

曾在威斯康辛大學追隨周策縱讀學位的學生，尤其有喜歡文學創作的，一定常常聽到他講述白馬社的那段文學史。老師在 2003 年為《白馬社新詩選》寫序時，有一段簡要的回憶：¹⁸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約於一九五四年，一批在美國紐約市的中國留學生，自動的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白馬」二字，由顧獻樑建議，取玄奘白馬取經之意；「文藝社」三字則由唐德剛提議加上，以免誤會作別的社團。雖然一年以前由林語堂先生出資支持了一個《天風月刊》，由林先生次女公子太乙主編，旅美中國留學生也有許多人參加投稿，不到一年，因林先生去新加坡主持南洋大學，《天風》停辦。事實上，「白馬社」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留美學生自動組織的第一個文藝社團。社團裏新舊詩人、小說家、藝術家、學者，都出了不少。當時，這些留學生還是無名小卒，可是胡適先生在紐約卻很重視他們，說「白馬社是中國的第三文藝中心」，就是在中國和台灣之外的第三個中心。

周策縱教授，除了對林語堂、胡適對白馬社的支持，感到感激，他認為顧獻樑也

¹⁶ 心笛：〈後記〉，《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頁 399-400。

¹⁷ 見王潤華等編：《創作與回憶：周策縱七十五壽慶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頁 117。

¹⁸ 《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頁 3。

很重要：

可是我在這裏，卻要特別紀念給「白馬」命名的那位朋友顧獻樑。他那時的夫人是馬仰蘭女士，馬寅初先生的女兒。他們住在紐約市區一個高樓上，裏裏外外都漆得朱紅朱紅的，我把它戲稱做「紐約紅樓」。當時我要德剛少搞些歷史，多寫些小說，寄他的詩就有「紐約紅樓夢有無」的追問，他寫出了《紐約紅樓夢》麼？可是不久以後馬仰蘭就去了非洲，顧樑（我們當時多半這樣叫他）竟和她離了婚，自己也跑去了台灣。¹⁹

因為顧獻樑和唐德剛是白馬社的創始人，前者很早就去了臺灣，後者的《胡適雜憶》一書的第五章，作過較詳細的報道：

胡先生當年在紐約閱報評詩之餘，他也時常向我說：「你們在紐約也是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第三個中心。」另外兩個「中心」據他說便是臺北和香港。他所以說這句話的緣故，就是因為五十年代裏中國知識份子在紐約也曾組織過一兩個文藝團體。胡適之對我們這種小文藝組織真是鍾愛備至，而他老人家自己也就自然而然地變成這些小團體的當然指導員和贊助人了。²⁰

一九五一年林語堂在紐約創辦天風社，出版《天風月刊》，有女兒林太乙主編。林語堂因為應聘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的職務，而全家離開紐約，因此刊物就停辦了。後來顧獻樑和唐德剛等人便組織白馬社文藝社，前者提議用「白馬」，含有唐朝玄奘留學印度白馬取經之義，後者加上文藝是怕別人誤會其組織的目的。

胡適之先生對我們這個「白馬社」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林先生去後，胡先生就變成我們唯一的前輩和導師了。他顯然是把他自己所愛護的小團

¹⁹ 《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頁4。

²⁰ 同上，頁399。

體估計過高，因而把它看成中國新文學在海外的「第三個中心」！

「白馬社」的組織，在範圍上說是比「天風社」擴大了，因為它有「文」有「藝」。²¹

當時算是白馬社的作家、詩人之外，還有吳納孫（鹿橋），他的名作《未秧歌》就是在白馬社時期寫的。周文中也因為白馬社而搞起音樂，成為作曲家，蔡寶瑜很年輕就成為美國頂尖陶塑界人物，她的早逝，對同仁打擊很大。

唐德剛對歷史與小說比較有興趣，他認為詩歌貢獻最大，胡適看重白馬社也因為是詩。他的看法正確：

胡先生最喜歡讀新詩、談新詩、和批評新詩。而白馬同仁竟是一字號的新詩起家。他們厚著臉皮彼此朗誦各式各樣的新詩。這些白馬詩人中有稚態可掬的青年女詩人心笛（浦麗琳）；有老氣橫秋的老革命艾山（林振述）；有四平八穩「胡適之體」的黃伯飛；也有雄偉深刻而俏皮的周策縱。……

在老胡適底仔細評閱之下，心笛的詩被選為新詩前途的象徵，「白馬社」中第一流的傑作。作者是個二十才出頭，廿四尚不足的青年女子。聰明、秀麗、恬靜、含蓄。詩如其人，因而新詩老祖宗在她底詩裡充分底看出今後中國新詩的燦爛前途。²²

「白馬社」詩人雖然不多，但以其作品的多樣化，就是一個詩壇。胡適喜歡的新詩都是純情的抒情短詩，如心笛的這樣的玲瓏秀麗的作品〈喜遇〉（一九五六、八、廿七）：

比祥雲還要輕

喜悅

²¹ 同上，頁 404。

²² 同上，頁 408。

在靜極的田野上
起飛
似一束星星
撫過一架自鳴的琴

昨日下午
碰見你
清湖的眼睛
隱顯中
漾起霧幻詩
浪散出不知名的字²³

一九五六年的臺灣詩壇，反共文學主導下，現代詩還不成熟，這樣高水準的純詩也不多見，怪不得胡適認為白馬社不但是中國和台灣之外的第三個文學中心，更是代表「今後中國新詩的燦爛前途」的作品。但是唐德剛說：

但是老胡適卻和我們的老革命艾山過不去。他說許山的詩「不好」。「不好」的原因是它令人「看不懂、也唸不出！」可是堅持只有「看不懂、唸不出」才是「好詩」的艾山不服氣。擁護艾山派的陣容也不小，大家紛起與老胡適辯難，他們甚至說，「新詩老祖宗」已落伍，思想陳腐，不能隨時代前進。艾山是聞一多先生的得意門生。聞氏生前就曾推許過「看不動、唸不出」的艾山體是「好詩」！²⁴

擁艾山派的人認為這樣的詩也是好詩，請讀艾山的〈魚兒草〉：

朋友對我講失戀的

²³ 同上，頁 349。

²⁴ 同上，頁 409-410。

故事我說譬如畫魚
明窗淨几
腦海裡另植珊瑚樹
移我儲溫玉的手心
筆底下
掀起大海的尾巴
鱗甲輝耀日月
綴一顆眼珠子 一聲歎息
添幾朵彩雲
借一份藍天的顏色嗎
夢與眼波與輕微喟的惜別
水是夠了
忘卻就忘卻罷
我卑微的園子 內生或死
都為裝飾別人的喜悅²⁵

這首非常現代主義的好詩，收集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暗草集》，由此可見白馬社的許多詩歌，尤其艾山、李經、心笛，在五十年代已寫出這樣的現代主義的詩歌，可說早已走在臺灣現代主義詩壇的前面，這是急待研究的被忽略的中國詩歌發展史的一章。從詩的本質來說，李經的詩最超越，可說是現代詩的登峰造極，可惜他創作嚴肅，作品不多。我有幸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在威斯康辛大學曾上過李經（盧飛白）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與艾略特兩門課，常向他請教，發現他的現代主義的詩與臺灣最好的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是美國芝加哥批評家 R.S. Crane, Elber Olson, George Williamson 和 Richard Mckeon 的高足，成為芝加哥批評家其中一位成員，他的艾略特研究，驚動美國學界。非常可惜《白馬社新詩選》中只有李經老師的三首詩，但都是極品，²⁶如〈葉荻柏斯的山道〉（第五曲，

²⁵ 同上，頁 24。

²⁶ 一九七二年逝世後，我曾編輯他的詩文集，詩 25 首，單篇論文 13，寄到臺北出版，後來稿件被出版社遺失。周教授的序文發表於《傳記文學》22 卷四期（1973 年四月）。我有兩篇論文

雞唱之前)，是一首跨文化的長詩，意象、詩的結構、智性與感性都有中國舊詩與艾略特現代派詩歌的傳統。²⁷下面這首紀念他與艾略特在倫敦見面的長詩的一段，可見其功力；²⁸

他清瘦的臉蒼白如殉道的先知，
 他微弓的背駝著智慧，
 他從容得變成遲滯的言辭，
 還帶著濃厚的波斯頓土味，
 他的沉默是交響樂的突然中輟，
 負載著奔騰的前奏和尾聲……
 他的沉默是思想的化身
 他的聲音是過去和未來的合匯。

由於適之先生對「白馬社」裡新詩的評語，二十年前紐約的新詩作家們與胡適之先生一場論辯，正如唐德剛的洞見所透視，讓我們對胡氏早年所受西洋文學——尤其是美國文學的影響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胡適認識的詩歌局限在西方學院派的四平八穩的浪漫主義的格律詩歌，雖然受到意象派的啟發，²⁹但其提倡的詩歌技巧與內容正是英美現代派詩歌要革命的對象。

同時這一群散居歐美的詩人，都在一九四九之前離開中國到歐美，正如痲弦所見，他們的創作基本上承襲並延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新詩的詩風，有獨立於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與大陸的詩之外，所以肯定自己是新文學運動以降中國文學衣鉢傳人。痲弦認為「此中詩人以周策縱為首，另有白馬社一些文人亦屬之。」³⁰

紀念盧飛白老師，本是附錄遺失的詩文集裏，見〈盧飛白（李經）先生的文學觀及批評理論〉、〈美國學術界對盧飛白的艾略特詩論之評論〉，收入我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臺北：東大圖書，1987年），頁246-268；269-275。

²⁷ 《白馬社新詩選》，頁243-4。

²⁸ 李經：〈倫敦市上訪艾略忒〉，《文學雜誌》4卷6期（1958年8月），頁8-9。

²⁹ 王潤華：〈從西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見《中西文學關係研究》，頁227-245。

³⁰ 痲弦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部分）（臺北：天視出版社，1980），導言，頁26-27。

五、周策縱的《胡說草》是一部新詩發展史

我上面說過，《白馬社新詩選》，或是至今尚未編好與出版的《海外新詩鈔》是一部五四以來的新詩發展史，這裡有類似自由派、新月派為的黃伯飛、湖畔四詩人唯美派的心笛、極前衛的代表象徵與現代主義的艾山。而周策縱教授的詩從五十年代寫到九十年代，從自由詩、格律詩、象徵、現代主義詩歌，甚至後現代主義詩歌，從文學研究會詩人群、詩湖畔四詩人、創造社詩人群、新月社（前期）詩人群代現代派詩人，甚至後現代詩人的作品，幾乎都可以找到典範性的作品。關於這一點，我將有專文討論。

周策縱教授在一九四八年離開中國到美國留學前，就已寫詩，目前《胡說草》存稿中最早的詩有寫於一九三零年的《竹》，題名雖然傳統，但想像力與構思突破傳統：

巨筆揮灑向天空
畫一幅潑墨雲霧
餘瀋一滴一滴成雨水
滄鬱地溜下來
黏不住翠綠的枝葉
挨在又圓又潤又薄又明之間過活
忽然，忽然，泥地上
無數纖纖的筆尖也上伸上伸
都爭先要寫向藍天
趁著春訊，猛地裡抖出生趣

他到了美國開始那十年，創作很多，可能有白馬社的原因，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海燕》共收六十八首詩，都是一九四九到五九的作品。³¹由於他大膽的試驗、詩不斷的轉型，試讀下面寫於一九九二的〈讀書〉，那裏像從五四走過來的詩

³¹ 周策縱：《海燕》（香港：求自出版社，1961年）。

人寫的詩：³²

他躺在床上讀書
從甲骨文直讀到草書
把頭髮越讀越白了
他用手去摸一摸西施的笑
她撲哧一聲發嗔說
你當初為什麼不呢

他臉也紅了
頭髮也黑了
一頁又一頁 有人待在誰的黃金屋裡
只聽見咯咯的笑聲
再翻下去
是一陣哭泣
他趕快把書關了
可是頭髮越白越讀呢

就如洛夫所指出，通過「一陣調侃，一種深沈的反思，處理手法頗有「後現代」的趣味。」³³ 余光中對周策縱的〈海峽〉（1996）這首詩讀了竟敬佩不已，因為「意象逼人」、他還說「匠心獨造，老來得詩而有句如此，可佩也。」請讀這首詩：³⁴

當然都是可以載船或翻船的水

³² 《白馬社新詩選》，頁 198-199。

³³ 《白馬社新詩選》，頁 224。

³⁴ 《白馬社新詩選》，頁 226-227。此詩發表於 1996 年五月二十五日的《聯合報》副刊，後收集於余光中、蕭蕭等編：《八十五年詩選》（臺北：現代詩季刊社，1997 年），頁 31。有余光中的小評。

不料從這邊或那邊望去
卻總有點兒水土不服

波濤上晚霞拖一條血紅的繩
不知會牽出喜事還是喪事
總比在別人屋簷下還好些罷

這水，有些人是親自渡過的
有些人是父母親渡過的
當然也有些遠祖父母……
這樣就能造成海峽麼

反正水沒記性
魚又不是太史公
然而，回頭就是兩岸
難道該讓人比魚還滑頭嗎

余光中指出：

海峽兩岸原是同民族，只有先來後到之別，無人種、文化之分。所謂「水土不服」，只半世紀的政治所造成。作者引用「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意，更益以喜事或喪事之變，來勸喻兩岸之人，用心很深。紅繩原可牽出喜產，紅的繩就未必了。這血紅的繩偏是晚霞所牽，意象逼人，匠心獨造，老來得詩而有句如此，可佩也。篇末以水與魚來與人比，指出人而忘本，將不如魚，又闢出一境。

此詩風格清俊，深入淺出，饒有知性，可以上追馮至、卞之琳、辛笛。所謂十四行，全無押韻，句法也不齊，甚至段式都呈「倒義大利體」，

前六後八，另成一格。³⁵

余光中所說「可以上追馮至、卞之琳、辛笛」極含深意，因為周策縱是一位敢於嘗試與試驗各種形式與內容的詩歌，由於他創作生命長久，在他一生所寫的新詩作品，幾乎可以輕易的找到代表各個詩派特色的詩，從胡適、康白情、徐志摩到聞一多、戴望舒、艾青到臺灣現代派及後現代的詩人。

關於這一點，我將有專文討論，這裡無法詳談。周策縱自己寫詩，實在帶有反映詩歌發展歷史的使命。他除了以各種形體的詩歌來實踐，也以一系列的論文來建構新詩的理論，在《棄園文萃》裏就有〈新詩格律問題〉、〈中國新詩的三種現象〉、〈定形詩體五要點〉等論文探討。³⁶ 他始終認為除了自由新詩、定形的現代詩是需要的，而且缺少大膽的創作實驗。

六、世界華文學的新視野

周教授除了中國學術的巨大貢獻與影響，他另一項貢獻是其他學者所沒有的，就是鼓勵與推動文學創作。由於長期與世界華文作家的交流與鼓勵，很多年輕作家後來都到威大教書或深造，以我認識的就有不少，如臺灣有丁愛真、洪銘水、陳博文、鍾玲、高辛勇、王曉薇、黃碧端、痲弦、羅智成、古蒙仁、周昌龍、蔡振念、嚴志雄、馬來西亞/新加坡有王潤華、淡瑩、黃森同、蔡志禮、香港有何文匯、吳瑞卿（兩人均沒有在威大讀書，但來往密切）、陳永明，大陸有陳祖言、陳致等。周教授的新詩常發表在《明報月刊》、《香港文學》、《新華文學》、《聯合副刊》、《創世紀》等刊物。同樣的，周教授也跟世界各地的舊詩人與書畫家有密切的關係，新加坡的潘受、大陸的劉旦宅、戴敦邦，香港的饒宗頤，臺灣的董陽之等，他對書畫不止於興趣，也有其專業性，如在一九九五年臺北書法界要編一本民初書法，特別請周教授回來臺北住了來幾個月，把《明初書法：走過五四時代》編好。³⁷ 因為當今學者沒有開拓過這個領域，當他的學生們預備為他出

³⁵ 同上。

³⁶ 周策縱：《棄園文萃》（上海：上海文藝，1997年），頁145-154。這幾篇論文都經過刪減。

³⁷ 周策縱（編）：《明初書法：走過五四時代》（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1995年）。

版一本「七十五壽慶集」時，他建議以創作作品，後來便成為香港大學出版的《創作與回憶》，裏面也收集了周公的新舊詩及書畫作品。³⁸

由於他與世界各地的作家的密切來往，本身又從事文藝創作，他對整個世界華文文學也有獨特的見解，具有真知灼見。如上面提到的，他一九四八到美國後，就自認要繼承五四的新詩傳統，聯合海外詩人，尤其紐約的白馬社，繼續創作，他所編輯的《海外新詩鈔》就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的一章，不可被完全遺漏。³⁹ 一九八九年新加坡作家協會與歌德學院主辦世界華文文學國際會議，特地請周教授前來對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的作品與研究作觀察報告。他對世界各地的作品與研究的情況，具有專業的看法。在聽取了二十七篇論文的報告和討論後，他指出，中國本土以外的華文文學的發展，已經產生「雙重傳統」(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同時目前我們必須建立起「多元文學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觀念，這樣才能認識中國本土以外的華文文學的重要性。我後來將這個理論加以發揮，在世華文學研究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

我們認為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的作者與學者，都應該對這兩個觀念有所認識。任何有成就的文學都有它的歷史淵源，現代文學也必然有它的文學傳統。在中國本土上，自先秦以來，就有一個完整的大文學傳統。東南亞的華文文學，自然不能拋棄從先秦發展下來的那個「中國文學傳統」，沒有這一個文學傳統的根，東南亞，甚至世界其他地區的華文文學，都不能成長。然而單靠這個根，是結不了果實的，因為海外華人多是生活在別的國家裏，自有他們的土地、人民、風俗、習慣、文化和歷史。這些作家，當他們把各地區的生活經驗及其他文學傳統吸收進去時，本身自然會形成一種「本土的文學傳統」(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東南亞地區的華文文學，以我的觀察，都已融合了「中國文學傳統」和「本土文學傳統」而發展著。我們目前如果讀一本新加坡的小說集或詩集，雖然是以華文創作，但字裏行間的世界觀、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對內行人來說，跟大陸的作品比較，是有差別的，因為它容納了「本土文學傳統」的元素。⁴⁰

當一個地區的文學建立了本土文學傳統之後，這種文學便不能稱之為中國文

³⁸ 王潤華等編：《創作與回憶：周策縱七十五壽慶集》。

³⁹ 先整理出版：《白馬社新詩選——紐約樓客》(臺北：漢藝，2004年)。

⁴⁰ 王潤華等編：《東南亞華文文學》(新加坡：歌德學院／新加坡作家協會，1989年)，頁359-362。

學，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國文學之支流。因此，周策縱教授認為，我們應建立起多元文學中心的觀念。華文文學，本來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中國。可是華人偏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與文學，自然會形成另一個華文文學中心；目前我們已承認有新加坡華文文學中心、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中心的存在。這已是一個既成的事實。因此，我們今天需要從多元文學中心的觀念來看詩集華文文學，需承認世界上有不少的華文文學中心。我們不能再把新加坡華文文學看作「邊緣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文學」。我後來將這個理論加以發揮，在世華文學研究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⁴¹

⁴¹ 王潤華：《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1994年），頁256-272。

